

生于1979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故事

晓
墨
著

 北京出版社 出版集团
北 京 出 版 社

生于1979

晓墨 著



北京出版
社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于1979 / 晓墨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6

ISBN 7-200-06398-3

I. 生… II. 晓…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3475 号

生于1979

SHENGYU 1979

晓墨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16开本 11.75印张 168千字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200-06398-3

I·951 定价:18.00元

质量投诉电话:010-58572393

生于1979



晓墨(晓墨轩主人):原名李蔚菲,生于1979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获行政管理 and 汉语言文学双学位。热爱写作,曾在《广州日报》发表短文《成名背后》和《游园惊梦》;在网站“榕树下”发表短篇小说《雨中的肖邦》和《红薯》。

选题策划：周莹

监 制：李树青 陈 飞

责任编辑：周莹

luckytree010@163.com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设计：标点工作室

父亲走了。

他一生钟情于文学，在病重期间仍关心着我第一本书的出版，希望临走前能亲手翻翻。

但，我却让他失望了。

希望这份迟来的礼物能够带着我的祝福抵达天堂——父亲所在的地方。

楔子

这是一个伟大的年代，我们都似乎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衰微的年代，我们重新为物质所禁锢；这是一个光明的年代，无数的法律承诺给予人类公平；这是一个温情的年代，权利与福利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残酷的年代，存在却无法兑现的权利仿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荒谬的“二十二条”，愚弄与被愚弄的都混淆了；这是一个虔诚的年代，我们都信仰着什么；这是一个桀骜的年代，不同的造物主已不再眷顾着他们的臣民；这是一个丰饶的年代，商品的供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令人惊讶的廉价与巨大；这是一个匮乏的年代，我们只能在混凝土森林上建造供呼吸的绿地；这是一个狂欢的年代，电子数码、生物技术、信息科技……人类似乎已成为世界之王；这是一个沟通泛滥的年代，我们坐在电脑前便可以与五湖四海交流；这是一个孤独寂寞的年代，我们敲打着键盘，看着电脑屏幕拯救空虚的灵魂。

如果你能认真看完以上这段格式严谨、思维清晰的文字，说明这是一个理智的年代；如果你能仔细看完以上这段莫名其妙、不合时宜的文字，说明这是一个荒谬的年代。这里作者必须说明，这是一篇小说，而且，是一篇有着独特时代背景的爱情小说。

第一章

仿照狄更斯的形式，我写下了上面长长的一段话。当然，这仅仅是形式而已。狄更斯生在当时世界中心英国的首都——伦敦，我则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个城市——广州。常识告诉我，我应该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告诉自己：中华民族是最强大的。何况，不少社会学家预言，中国将成为日后世界的超级强国。因而，我们今天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我曾为我出生的年代感到沮丧。早出生 100 年，遇上随意造就英雄的年代，谁敢肯定我不能成为革命的先驱者；早出生 30 年，碰上与共和国同年的生日，说不定我已成建设的先锋队；早出生 20 年，刚好可以赶上那场长达 10 年的“热闹”，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发泄身上过剩荷尔蒙的机会，尝尝“颠覆权威”的味道。

1979 年，所有的风暴都在这个国家里平息了，我们又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我曾经想过，平稳发展是否就是“倦怠”的代名词，或者平稳中其实隐藏着更大的暗流，暗流把我们推上了另一条与前代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暗流静静地塑造着另一种不易被察觉的新秩序。就像母亲肚子里羊水的暗流，静静地孕育着婴儿。

当时，在母亲子宫里的我可谓是这股暗流的受惠者。为了积极地响应，

我出生的时候体重7斤整。听说同年出生的几位小玩伴体重都不相上下。变革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开始，证明鲁迅先生笔下9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话已经发生了逆转。

听老妈说，她看着当时护士手上胖乎乎的女婴，心里就充满了美妙的憧憬，希望我以后能考上当地最好的大学，受最好的教育。虽然我极其怀疑她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是这句话却说明了这个时代另一样伟大的事物——高考。

平凡如我，在1979年已被结结实实地授予了入读高等院校的考试权；平凡如我母亲，也被结结实实地授予女儿接受高等教育的幻想权。只是，当母亲手里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脸上的表情像吃到了变味的水果。1997年，中国高校实现从“并轨”开始的上大学由免费到交费，而后毕业生由统分到自谋职业的改革。在开学的那一天，我看到了许多头发花白、晒得皮肤黝黑的父母，饱含着希望的眼光，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把皱巴巴的人民币掏出来，塞到比他们高大的儿女手里。不敢在消费畸高的城市里多逗留，他们大都坐当日的火车离去，像负重的骆驼，微弯的背里藏着多少难以言喻的艰辛。但从乡村到城市，高校学府毕竟给了他们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的最大希望。

上了大学以后，我才明白，在这群穿着简朴的外地学生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考。然而4年后，他们又将面对毕业生由统分到自谋职业，双向选择的就业形式。生于1979的我们比前辈的师兄师姐们更多地体会了“压力”这一词的真正意义。

4年后，老妈如愿地站在了她希望我考上的广州那所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前，在极拥挤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位置强作一笑。相机闪过，一大群穿着蓝色蝙蝠衣或黑红蝙蝠衣的人便来抢位置了。老妈问：“你的衣服跟他们的怎么不一样？”“妈，人家蓝色的是硕士服，黑红的是博士服。”老妈静默了，照了几张便找个借口跑掉了。我不明白老妈自惭形秽的原因，难道她真的相信报纸上说的“高等院校重量不重质”？若非如此，高学历人数的急剧增长，对国家而言也并非一件坏事。

话题扯得太远了，言归正传。话说护士手中胖乎乎的女婴，事实上，睡在床上的老妈当时并不知道是女婴。听说，老妈跟护士进行了一场极为感人的对话。

“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

“儿子女儿我都无所谓。”

“那就好，你生了个女儿。”也许这段话在老一辈和年轻一辈的人看起来实在毫无必要。然而在当时，不少产妇却因为承受不了答案而当场晕倒。

1980年，国家提出，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79年，母亲们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高速生产都是没法赶上二胎了，于是，我很骄傲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听说，奶奶无法承受大媳妇生了个女儿的事实，连夜赶到医院，投诉医院把她的男孙子给换掉了。我没缘亲眼验证当年的惨烈。改革的力量就在于此，数千年来形成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就这样被硬生生地一年年地磨去了。

计划生育政策塑造了与众不同的一代。他们如天之骄子聚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若蜂群里的蜂王身系全家希望；他们孤独寂寞，亲人的保护是一道道不可逾越的铁网，看着外面的世界，他们逐渐失去了向外走的渴望；他们喜怒无常，过度的关怀与抚爱令他们性情乖张；他们患得患失，成功与失败变得空前沉重；他们自以为是，以为世界就像小小的家庭一样，是因其而生的；他们笑，因为幸福来得太简单；他们哭，因为再得到幸福太困难；他们麻木，对关心视而不见；他们敏感，对伤害记忆犹深；他们在学业、爱情、事业、生活中跌跌撞撞；他们痛疼地思考着；他们孤独地成长着。他们生于1979。

二

生于1979的我是个硕大的脑袋，圆滚滚的像个大白瓜。老妈为了我这个大脑袋吃了不少苦头，硬从23号憋到了25号，还被定为高危产妇被迫转

院生产。幸运的是，中山医学院的一位著名的妇产科老教授看上了我。我缓缓出现的大脑袋上的大耳朵幸运地碰上了他对学生们的经典临床讲解：“你们看，这位产妇已经相当危险，婴儿的羊水袋已经破了，在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你们应该……”听说，这一医学案例还被作为该教授的论文内容之一，登在了某期的学术刊物上。

因为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从小便确信自己不平凡。我比任何人都肯定自己的思考能力早在我获得行动能力与语言能力前就已经苏醒了。

有一个很难解释的场景很早很早以前已经在我的头脑里跳跃了。那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座破旧的西欧式石城堡，山坡上绿草如茵，嫩绿的青草与暗灰色的城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站在山坡上，思考着什么，好像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但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天色渐渐变暗，很深很深的绝望感便浮上心头。这个场景在我3岁以前反复地出现，直到10岁又突然地消失了。我曾经在玄学中寻找答案。答案对我说，我的前生是西欧人，前生的记忆没有去尽，结果带到今生来了；我又在心理学中寻找答案。答案对我说，这来源于幼年的记忆，也就是说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了类似的建筑、类似的草地。但是，绝望感呢？谁能解释这当中包含的深深的绝望感呢？这个可怕的场景害得我初中时险些成为了先验论的追随者。

当我躺在母亲的怀里，叼着奶头，苦苦思考一堆即将面临的悠长而艰辛的人生问题时，母亲正呆坐着盯着桥上来来往往的人。广州这个城市就是这么奇怪，人不知什么时候就和历史扯上了关系。住的老房子突然成了古迹，而且冒出了一大段曲折离奇的恩怨情仇；走的路终有一天被盖上了玻璃盖子，自己天天踩的居然是几千年前铺好的古街道。就像抱着白天睡得太多而晚上不肯睡觉的我在桥头吹风的母亲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站的这座桥是200多年前的古桥，是一位科举考生上榜后为永留青史而兴建的。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在这座桥上杀了50多人。历史文物就是这么一样东西，远古的荣耀与近代的屈辱，狂欢与恐怖，人的理性行为与非理性冲动都被记录在一件物体上，而这件物体因为刻上了人的行为而具有了一种价值。当这

件物体恰好是联结两个地方的一座桥，在我以后人生的无数次梦中，它刚好便成了时间漩涡空隙的填充物。我站在这座桥的中央，惶惶然不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每向前走一步都仿佛会把送我进未来与现实杂糅的混沌的黑暗中。抱着我的母亲当时不知是否也感受到了这股涌动的时光暗流。或许她当时心里惦记着我正在上班的年轻的父亲，又或许，她更关心的是桥这头与桥那头的蔬菜价差。

上班的父亲不知能不能感受到母亲的爱意。反正那几天绑在竹椅上的我，等到父亲下班后，都无一例外地除听见高分贝的噪音外，还看到了呈抛物线状在天空飞动的簸箕。父亲后来告诉我，当时我看着这只簸箕，睁大眼睛，眼球呈抛物线状追逐着这只簸箕。我告诉他，当时我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婚姻就像在天空中飞动的簸箕，从一个人的手里扔到另一个人的手里，然后划出一条又一条完美的抛物线。归根结底还是脱离不了其力场束缚的状态，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在轨道中飞动却又脱离不了轨道，这就是理性的人类追求的情感的物理状态。在我还没有爱情的时候，我已经了解了婚姻。

三

母亲说我11个月就会说话了，而且说起来都是成篇成幅的，部分吐字清晰，简单明了，部分似乎很“高深”，却又不知所云。其实父母都不知道，我在他们面前说的话，比不上我在他们背后说的1/10那么多。

我是一个多话的人，从小我就爱絮絮叨叨地说话给一位伙伴听。他与我一般大，我问，他答，他答，我问。他从不跟我争父母的爱，不跟我争玩具。当然，我也会很大方地邀请他一块儿玩。我们甚至会玩一些比较高深的游戏，比方扮演晚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的角色。他不会拒绝我给他的任何角色，甚至是吃人的熊、骗人的狐狸。吃饭的时候，他坐在我的对面，和我吃同一碗饭。当我被父母责骂的时候，他和我躺在一起，看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安慰我，用手指擦去我眼角委屈的泪水。他就这样陪伴着我成长，

我有时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呼吸、一语一笑。直至有一天，我和他交谈的时候，老师正好让我回答问题。我没答出来，老师就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晓墨同学，请你在上课时不要自言自语。”那一刻的惊吓非同小可，我突然意识到，他的存在在正常人眼里是不合理的。难以避免的羞辱感使他渐渐地远离了我的生活，但我依然感觉得到他的存在，否则，现在与我交谈的人又是谁呢？现在在键盘上敲下有关于他的字句的是我，还是他呢？

后来我知道了，每个独生子女身边都有这么一个他。他们在骑车时和他们的他们谈话，谈得兴奋了还会笑。那时已经深信远离了他的我，也会偷偷地笑。

1979年的一代从尘堆中重新挖出来了很多很多的旧名词，从舶来品中再挑选出很多很多的新名词，我从中拣出了两个，孤独与人格分裂。

独生子女，顾名思义。缺少同龄伙伴的生活是痛苦的，这是上一代人没法体会的。人的心理需要补偿，于是我们在心理上创造出了一个“他”，一人分饰两角，以此来排遣成长中的各种烦恼与忧愁。

希区柯克的一部电影《惊魂记》中男主角恐怖的笑容，一夜间让全世界的人都从心底产生了对“人格分裂”的恐惧。恐惧不是外来的而是源于自身。西方物质社会的高度发达，人类信任的短缺与交流的闭塞、孤独催生了人格分裂。生于1979的我們的人格分裂，却是由独生子女的孤独催生的。等我长大了以后，我突然意识到，人格分裂症使我在潜意识里缺乏信任感，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使我渴望交流而又害怕交流。我爱情上的数番落败，是因为我把信任都给予了“他”，认为世界上除了“他”以外，所有人都可能背叛与伤害我。

没有兄弟姐妹，生长在封闭大门里的我，就这样和“他”聊着天，度过我的童年。摆在我面前的“过家家”玩具里有两只杯子、两只碗、两双筷子。所有的迹象说明，我没理由怀疑“他”的存在。

四

一个人的时候，我会翻翻书箱，捡起一本本尘封的书本，吹去上面的尘末，再从发黄的书页中寻找那些逝去的岁月。经历过红色岁月的上一辈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往事总有拂也不拂不去的沉重。而生于1979的我们，往事却有找也找不回痛惜。我们坐在记忆的小舟上，任凭时代的风浪任意改变回忆的内容与方向，左右我们的喜怒哀乐。

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本书，扉页上写着清秀的两行字：“祝晓墨学习进步——丽仪送。”母亲说，丽仪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常为了我被别人打得鼻青脸肿。我搜寻着这一段记忆，终于想起了这个脸圆圆的好朋友。与此同时想起的还有一个湮灭了的名词——“公家”。

我和丽仪的相识缘于一只木制的小花瓶，也有可能是更早的时候，但是我记得的只从这只花瓶开始。我很喜欢它，当然喜欢它的不止我一个，有几个小男孩也争着玩。推推搡搡间，丽仪站在了他们面前。她抢过这只花瓶，高高举起，义正辞严地对那几个小男孩说：“这是公家的，不是你们的。”在此以前，我只从大人的嘴里听过这句话，幼儿园老师每次在收拾不多的几只塑料玩具时，嘴里总会叨叨着这么一句话：“不要玩了，这都是公家的，下课了，赶快收起来。”我没见过“公家”，在我当时的认识里还没有抽象和具象的分别，想象中“公家”可能就如母亲嘴里说的厂长吧，反正就是在背后掌握着所有东西的人。

当“公家”这个词从丽仪的嘴里吐出来以维护个人权益的时候，她在我眼里便有了与众不同的威严。我私下怀疑她与“公家”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趋炎附势的本性使我慢慢地和她靠近。每天放学，我都要母亲等着她母亲一块儿走。我们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谈天说地，但每到渡口附近，我们都被逼分道扬镳，她们走左边，我们走右边，其实目的地都一样。我嚷嚷着要和她一起，她也嚷嚷着要和我一起。终于，她母亲让她如愿，她终于和我坐上了

同一班渡轮。她看着外面涌动的江水，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平时坐的渡轮比这大多了，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汽车在旁边。我看着她，心里并不快乐。其实，我并不是要和她坐同一班渡轮，我只是好奇她走的路为什么和我走的不一样。

母亲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丽仪的妈妈认识码头的人，她们可以拿到免费的渡轮船票。”

可能码头的人也跟“公家”有点儿关系，和“公家”认识就能坐大船，不认识的就只能坐小船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的妒忌，不能不让人怀疑“人之初，性本善”的正确性。

我和丽仪真正的分道扬镳发生在两年以后。为了入读当地最好的小学，我们同时投考了当地最好的“工农兵幼儿园”。考试以前，我母亲和丽仪的母亲坐在门外。同样是望女成凤的家长，谁不是竭尽全力放手一搏。母亲的神情颇有点儿洋洋得意，她坐在一群母亲的中间，婉转地夸大自己女儿的天分。我和丽仪进入考室以前，她暗暗地掐了我一把，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没有看她，甩甩头便进了考室，有点儿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试题出乎意料的简单，不过10位数以内的加减法加背一首小唐诗。不需5分钟，我就圆满地答完试题走出考室。我走的时候，丽仪还坐在桌子前似乎很为难。母亲看着早早出来的我，兴奋地抱了我一下。3天后，我和母亲再次来到了“工农兵幼儿园”，结果是丽仪被录取了，而我落榜了。丽仪的母亲带着胜利者的笑容对我尴尬的母亲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呀？这种事不走走后门怎么能行呀。”

“后门？”“公家？”“公家？”

“后门？”一种深深的被愚弄的感觉浮上心头。

自此，我刻意地避开丽仪。她显得很委屈。但谁又能理解几岁的女孩子心里承受的来自上辈的期望与自身觉醒交杂的重压呢？

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居然有幸见证了“公家”最后的辉煌。母亲在事业上的成就是随着“公家”的湮灭而逐渐显现的，而也有无数人的期望与依归

却随着“公家”的湮灭而变得无迹可寻。他们曾理直气壮地将自己生老死葬归附于这高高在上的物质所有者。而所有者终有一朝如灰烬般消失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数年后，我经过母亲工厂的旧地，见到花白头发的故人拎着大大小小的包袱，依依不舍地关上工厂的大门。透过大门的间隙，我依稀看到幼儿园的墙角，关于“公家”的所有印记将被挂上一个“废品站”的牌子而被永远封闭。我下意识地加快脚步，害怕幼儿园的老师跑出来拉住我说关于“公家”的事情。

五

我突然陷入了深深地思考：我生活的主题是什么？我回忆的主题是什么？我思考的主题是什么？我成长的城市的主题是什么？我所生长的时代的主题是什么？生于1979的我们的精神的主题又是什么？我发现，我居然没法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混乱的节奏、重叠的资讯、焦虑的精神。我每天都在寻找方向，方向却先于我的发现而变更。主题、原则，所有既定的框架在这片传统的土地上只经过短短的二十几年就变化得天翻地覆。

生于1979的我们，在爱情面前勇敢地拒绝了名词的定义。当我在Z大刚上大一，被英俊的继东师兄抓住被迫讨论“问题”的时候，我说起了初中时候同桌的一个故事，为的就是显示生于1979的人的这股勇气。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他穿着蓝白的校服，很认真地听完思想政治课。讲课的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当天的课题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课后，同桌跑上讲台，与老师的对话如下：

“老师，你刚才说社会主义阶段是共产主义阶段的一部分？”

“是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共产主义了，是吗？”

“不是，我们是社会主义。”

“既然是它的一部分，那按照数学关系来说就是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那也就是说，我们说共产主义，也就包括社会主义了。”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后期阶段称为共产主义。”

“老师，我还是不明白，既然包含了社会主义阶段，那按线段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了。”

“不是的……”老师冒汗了。在定义的陷阱里，在名词的迷宫中，他显然迷失了。他试图解释，却无法破解最简单的数学理论中类似“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真理。到底物质世界与精神领域中，孰真孰假，还是这两者之间有谁被愚弄了呢？

我对继东师兄这么说着的时候，没有忽略看他的眼睛。他思考的时候，乌黑的瞳仁外的眼白泛起一种淡蓝，像夏天深圳小梅沙的海水，使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要说的话的主题。改动一下顾先生的诗句，来一段“你看天时很浅很浅，你看我时很深很深”。如果说人必须有一种确信，那在我心里，或者唯有美是值得确信的。起码在美的氛围中，我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来自情感神经的冲动。

继东师兄对我显然没有这种情感的冲动。他生于1972年，那个英雄的地位遭受到冲击却又重新证明坚不可摧的时代。从他的名字中你便可以那么真切地感受到来自他与他家庭的信仰的积淀。我曾经很疑心这位读博一的师兄身上的纯真信仰与严密的理论体系之间的统一共存。事隔多年，我依然记得那天晚上明亮的月光和他淡蓝色的眼白。但他那天晚上对着我们这帮大一师弟妹说的话，我却只记得那么一点点：“你们缺少精神和信仰，你们以为得到了自由，但在没有信仰精神的世界里，你们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然后逐渐地，你们成为了物质的俘虏，由世俗的东西去左右你们的狂喜与困顿。于是，你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萎靡，颓废……”如果可以用一个艺术品去形容当时的继东师兄，可能只有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那个逝去年代的英雄主义者，与湮灭名词同时成为永恒的象征，留给现代除了美的印记，其他